



# 现实主义、理想与历史逻辑

南帆



### 谋求真正的发现,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必须包含积极的探索,理想的

### 的表述、历史逻辑以及历史预言均是探索的主题。生活的表象层层叠叠,激情、欢乐或者痛苦、愤怒彼此激荡。然而,这时的“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忙碌地记录经验。作家的目光必须超越经验的拘囿,力图提出深刻的历史展望。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作家说来,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间才能满足他们的艺术雄心。这些作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意图——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将为未来的理论总结提供重要的依据。

作为一个文学术语,“现实主义”似乎从未遇到冷场。“现实”是一个巨大而坚硬的存在,文学无法也不该视而不见地绕道而行。作家必须勇敢地直面“现实”,这个简单的理由是支持“现实主义”长盛不衰的基本事实。然而,进入众多文学术语共同组成的理论场域,“现实主义”是否存在更为严密的理论涵义?如果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声称它们从未放弃直面“现实”,“现实主义”可否提供另一些独一无二的內容?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时的“现实主义”多少有些面目模糊、边界不清,如同一把由于过多的使用而磨损的理论钥匙。

另一种辨认“现实主义”的方式并非围绕文学术语展开理论思辨,而是依赖文学阅读经验。例如,文学阅读很快察觉,福楼拜或者巴尔扎克笔下的生活场景或者人物性格存在某种共同的意味,人们倾向于将这种意味视为现实主义的风格标志。狭窄的街道两旁一排倾斜的、污迹斑斑的木板房,一个秃头男人正在超市货架上挑选便宜的婴儿奶粉,教室里趴在座位上的女生装着没看见邻桌的男孩抛来的小纸团,弄堂里一个正在给煤炉引火的妇女指桑骂槐地讽刺那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的少女,刚刚收摊的小贩神情疲惫地在饭桌上抚平一张张皱巴巴的纸币……这些带有烟火气息的日常景象形成了粘稠的生活洪流缓缓移动,人们可以从其中掂量出现实的重量。现实主义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日常景象,同时还无形地维护某种稳固的基本逻辑:一日三餐、朝九晚五,所有的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因果规则稳定地控制着生活的基本节奏和人物内心的起伏。历史可能缓慢地酝酿一场必将来临的风暴,人们可以从各种生活细节提前发现众多的征象。总之,没有匪夷所思的奇迹。没有哪一只猴子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气,一群活蹦乱跳的猴子出现于四周——《西游记》称之为“神魔小说”而非现实主义;没有哪一个美少女踏上一块毛毯,悠然飞向空中,《百年孤独》在“现实主义”之前加上“魔幻”的形容词;当然,也没有哪一个小伙子跌落悬崖,中途被一棵松树托住,然后爬入一个隐蔽的山洞,意外地发现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多年之后这个小伙子再度现身,他已然是天下无敌的一代大侠——这种奇幻的情节属于金庸和他的同道热爱的想象方式。

的确,金庸不属于追求“现实主义”的桂冠,他更愿意纵情挥洒自己的不羁想象。金庸的文学江湖没有那么多限制。那儿的人物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为人处世更为恣意潇洒,许多小概率的可能总是令人惊喜地成为幸运的现实。相形之下,那些现实主义作家远为拘谨。他们兢兢业业地再造一个可信的生活环境,所有的性格必须与生活环境协调一致。所谓“可信的生活环境”,通常表明的是一个凡夫俗子可以自如生存的空间。因此,不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表示,必须知悉小说之中每一个人物的经济收入,否则,他们无法构思这个人物出门要去哪一个饭馆,或者给岳父大人送的是什么礼物。当蔬菜价格、办公室的飞短流长、商务客户的弦外之音或者如何对付周末那张请柬共同挤入视野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将逐渐丧失单纯的品格而显现出多面特征。然而,金庸的武侠轻松地甩开这些俗不可耐的烦恼。他们纵横天下,出入客栈酒肆,大块肉、大碗酒,从来不需为经费发愁。他们的躯体隐含了惊人的能量,特殊的经络修炼将这些能量汇聚于掌心,足以开山裂石;他们的内心具有极为充沛的情感库存,各种恩怨情仇数十年持续不已,甚至愈演愈烈。这些人物身怀异禀,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侠肝义胆,快意恩仇,华山论剑,独孤求败,没有人愿意提到洗浴更衣、挑水劈柴、头疼脑热这些日常的琐事。在我看来,武侠小说的首要类型特征,即是剔除日常生活。许多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成人的童话”,没有必要到“成人的童话”之中迂腐地核对各种生活细节。

“童话”这个概念是否缺乏足够的分量?许多人宁可挑选“历史”一词组织褒扬之辞——金庸拥有丰富而扎实的历史知识。不论是宋金冲突还是满汉对抗,众多武侠频繁穿梭于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金庸的叙述开阖有度,游刃有余。从民间习俗、边陲风貌、江湖帮派到皇家王族的礼仪与人情世故,种种景象纷至沓来,汇成古色古香的逼真气氛。然而,历史表象未必指示历史逻辑,历史知识未必带来历史感。当文学与历史成为两种相互衡量的文化门类时,我愿意深入“历史”概念,进一步对“历史表象”与“历史逻辑”稍作区分和解释。从服饰装扮、风俗礼仪到官吏制度、武器配备,丰富而扎实的历史知识指导金庸准确地描述一系列历史表象。然而,历史表象的静态堆积无法显示古往今来演变与沧桑。历史运动的解释必须诉诸连续历史表象持续延展的历史逻辑。换言之,历史逻辑是历史运动依循的方向、轨迹、时机和规律,带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意味。不论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概括还是“凡是合乎理性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合乎理性”的历史哲学,或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种种观念无不表明了思想家预设的某种历史逻辑。相似的是,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满足历史表象的复制,他们的作品时常形象地寄寓了历史逻辑的独特理解。卢卡契在《现实主义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揭示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间接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不是直接地露在表面,因为它们是相互交错的、不平衡的,它们只是有倾向地发生作用的,所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上和世界观上就要进行巨大的、双倍的劳动,即首先对这些联系在思想上加以揭示,在艺术上进行加工,然后并且是不可或缺地把这些抽象出来的联系再在艺术上加以掩盖——把抽象加以扬弃。”不论卢卡契是否低估了文学构思之中的汹涌激情以及形象的独立繁衍,人们至少可以发现,许多现实主义作品的确隐藏了一副洞悉历史逻辑的深邃目光。可是,金庸并没有展示出这种雄心——他的历史知识没有转换为独到的历史判断。那些武侠仅仅在教科书提供的背景框架内部活动,大部分剧情局限于民族与皇权的古老主题。他们仿佛大动干戈,搅得满城风雨,然而,围绕武功秘籍或者华山论剑的情节从未真正撼动历史,改变什么或者增添什么。

对于这种异议,金庸的拥戴者可能嗤之以鼻:所谓的历史逻辑那么重要吗?金庸的作品风靡汉语世界,又有哪一个号称发布了历史信息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望其项背?在我看来,这个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这个主题乏善可陈,那么,金庸的巨大感召力源于什么?悬念、惊险、奇幻、曲折的情节令人欲罢不能,这些仅仅是暂时的原因;真正的感染来自那种血脉贲张的人生:笑傲江湖,壮怀激烈,坦诚无忌的爱或者光明磊落的恨,不必掩饰隐瞒,不必委曲求全。与郭靖、洪七公、萧峰这种人人为伍,叱咤风云,悲天悯人,哪怕遭到九阴白骨爪或者蛤蟆功的茶毒也比一辈子混迹于世俗的家长里短有趣。总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举杯邀明月,得意须尽欢,对于日复一日匍匐于风尘之中的庸常之辈,这种人生理想令人神往。的确,“理想”这个久违的词语出现了,这是比拘谨的历史记载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内容。历史只能以纪实的形式在地面爬行,文学可以追随飞翔的理想自由虚构。日常用语之中,“虚构”包含了杜撰、臆造、谣言乃至信口雌黄、制造骗局之意。无论是联合国大会发言还是同仁之间的彼此商讨,断言对方虚构通常意味着谴责。然而,文学享有虚构的特权。现代社会仿佛设置了一个必要的道德缺口,文学的“不实之词”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合法性,甚至倍受赞誉。尽管作家和读者共同承认文

本之中的事件从未发生,他们仍然倾情投入,悲喜交加。金庸在虚构的武侠江湖寄存了至情至性的理想,强烈的光晕甚至让那些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黯然失色。

从陶渊明简短的《桃花源记》到托马斯·莫尔洋洋洒洒的《乌托邦》,人类时常借助文学虚构表述社会理想。作家通常想象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空间: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财富分配方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的教育体系,拔地而起的海市蜃楼往往将卑微的现实反衬得庸俗不堪。然而,由于理想的社会模型不得不依赖众多社会条件的配置,更多的作家乐于虚构某种理想的人生:万贯家财,绝世武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娇妻美妾,白马王子,功成名就,儿孙满堂,隐逸田园,吟风弄月……另一些时候,种种依附于个人境遇的理想被称之为“欲望”。社会理想具有普遍意义,“欲望”更多个人化的内容。

对于文学想象说来,按照“欲望”提供的原型构造若干心旷神怡的情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金庸的答卷赢得了交口称赞。许多作家擅长叙述曲折而紧张的情节:一代武林宗师暴毙。武林秘籍重现江湖。茶楼的角落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正在品茶,双目精光四射。街道的拐角,一高一矮两个戴斗笠的汉子鬼魅般地闪出来……好了,故事已经开始,情节内部的巨大惯性带动作家轻盈地御风而行,甚至把他们拖得跌跌撞撞。事实上,作家需要提防的往往是事情的另一面:不要过分纵容虚构的夸张与神奇,以至于不慎滑入可笑的荒谬,例如“抗日神剧”之中的“手撕鬼子”,或者将手榴弹抛到空中炸毁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可笑的荒谬通常来自这种状况:夸张与神奇完全丧失了历史逻辑的支持,以至于找不到任何现实接口。

事实上,现实主义从不反对显现理想,只不过这些理想必须接受历史逻辑的审核。“希望”与“欲望”的区别恰恰是,前者与历史逻辑存在重要的联系,后者仅仅是幻想构成的廉价安慰剂。如果理想即是历史逻辑展示的未来图景,现实主义文学将会成为历史的预言。的确,卢卡契就是如此形容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除此之外,它还认识和刻画一种在刻画时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掌握和刻画这样一种潜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锋们在文学方面所要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

也许,现今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卢卡契,这个理论家似乎有些过时。然而,卢卡契对于现代主义的厌恶可视为一种狭隘,卢卡契对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毋宁是真知灼见。尽管人们可能指出,卢卡契的相当一部分理念并未兑现,历史远远脱离了他的预想,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是证明卢卡契现实主义观点的失败,而是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难度。如果卢卡契充当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理论思辨无法成功地兑现为文学实践。也许,我还可以引用《乌托邦之概念》一书序言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个事实的一个后续补充:“乌托邦思想,在想象、希望和致力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是人类的抱负和政治文化中永远存在的基本要素。”当然,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成功的、不那么成功的乃至失败的努力,同时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对于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潜入现实谋求真正的发现。

谋求真正的发现,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必须包含积极的探索,理想的表述、历史逻辑以及历史预言均是探索的主题。现今,几乎所有的人都以察察中国大地的灼热温度,最新的一页历史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无数迥然异异的人生故事不断涌入视野,前所未有的经验纷至沓来,“沙尘暴”一般的海量信



(作者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 ■第一感受

读罢朱涛新近创作的200余首诗,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诗人究竟为何而创作?对此,古人似乎早已给出了比较确定的答案,《毛诗序》里曾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无论是嗟叹咏歌,还是手舞足蹈,诗歌创作的目的从本源上讲都是“言志”。但是把时间的指针调整到21世纪后,“言志”自然早已成为多数人触手可及的语言权利,诗歌也不应仅仅再局限于“言志”的范畴,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有更丰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旨趣。至于诗歌创作的自在的“言志”的大前提下深化或者细化成什么样态,仍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朱涛的诗或许能在这一问题上给人启发,我个人以为朱涛写诗的目的在表达之外,恐怕还包括寻找自我想象力和语言艺术的极限。他好像从未满足于以往的奇思妙想,或者说,本来已经触摸到带着光晕的艺术“灯塔”的他,又总是要去追求某种比“灯塔”更高、更远、更美好的艺术境界。

在当下诗坛中,朱涛的诗属于最难阅读的那一类。这种难度并不是来自于诘屈聱牙的语词,而是实实在在地来自智力和想象力的考验。读者必须调动全部的思想智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诗歌鉴赏力乃至理论素养,才能感受到朱涛诗歌的独特美感。

朱涛的诗歌创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玄奇的想象一直是他诗歌最主要的推进方式,在他的作品里很难找到完全写实的词句,天马行空的词句让人目不暇接。我们看这首《荒草乐园》:“仿佛再无可刈割的人类荒草/长出手来/缠绕铁丝网/光顾你们均匀的呼吸/异乡口吃的风/涌向这张嘴/湿润难蒸的心房/用尘土捏透的头走路/遇见的天堂/都是身后浸泡的深渊/皮靴,不管为谁收获/撼不动死亡披上的外衣/从枯黄的河滩升起/搅动蜡烛波纹的嗡嗡

## 穿越而来的“惊奇先生”

——朱涛诗歌印象

罗振亚

从末忽略过思考的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确实在经历一场变革,变革的过程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但变革本身却实实在在地蕴含着进步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或许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至今依然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呼唤“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这是一个被精密设计的梦想世界,于是,诗句中的那些看似全不合逻辑的想象背后,潜藏着多层次的复杂隐喻。从这一点上看,朱涛的诗更像是普鲁斯特的创作,他们都对思想和语言的碎片进行了奇妙的重组,并通过这种重组在语言内部和想象空间同时进行一种有组织的、内在的谋反,这种谋反表面上并未取消任何规则性的东西,只是在暗中通过凸显其中一部分,而使其余的部分陷入黑暗。这种方式在小说创作里往往表现为某种独特的叙事方法,而在诗歌创作中则外化为类似于朱涛的这种奇异的想象。

由此可见,阅读朱涛的诗,真正可行的方法并不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或者绞尽脑汁地拆解一层层的隐喻,费尽心力搞清楚本体喻体和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可能只会让读者更加困惑。尽可能的调动感官和思维,去捕捉诗人的情感逻辑,才是打开朱涛诗歌世界大门的钥匙。换句话说,朱涛的诗是最适合多意解读的那一类文本,以致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述或者概括,只能从写作这一动作的本源上去理解。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朱涛的诗拥有了某种超越历史性的价值,这样的诗和想象力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称道的,但这并不是朱涛的诗引人注目的全部原因,但他的创作其实兼具思想性和历史性,他在诗中想要诉说的情感也绝非只是一时的奇思妙想,在想象的同时,朱涛也

我们引以为傲的/唯一/闪烁尘世的诗篇”。这种略有宣言意味的表达,与其说是赠予曾经站在诗的高峰的北岛,倒不如说是对那一代诗人的集体认证,“火堆中舞蹈的消防员”是绝妙的比喻,这一份承担与坚毅在依然晦暗的前路上显得格外耀眼。从朱涛的诗来看,我相信他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有时沮丧、会愤怒、甚至会故意把最黑暗丑恶的世界毫不保留地袒露出来,但他的心中最终总是会有一点思想的光亮。

思想的力量在朱涛的诗中随处可见,他的所思所想也是包罗万物,无论是在枯燥的生活中还是在忙碌的旅程中,一些经常被他人忽略的景观都可能成为朱涛思考的起点且很难预测这种思考的终点,更为可贵的是,朱涛把思想的深刻与语言的传神精妙结合,就能带来较强的阅读快感。强大的思考力让朱涛的诗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融入了理性的光辉,其思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可能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朱涛的诗多数是写在旅途的间隙,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思考和创作行为。可以说,朱涛是一位身体和灵魂都一直在路上的诗人,诗歌才更像是他的家,称得上是诗歌界的“时间旅行者”。

提起朱涛诗的语言,第一印象就是高度的陌生化。这种在诗歌创作领域比较常见的艺术手法本来并不值得过多地描述,但奇妙的是,陌生化效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身上发生效应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斑斓的色彩,这也是诗歌艺术最有魅力之处。朱涛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一方面来自于其驾驭语言的天然和取之不尽的想象力,这使得朱涛的诗注定不会平凡,总有惊人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其有意营造的语

言境界,这虽然是技术层面的努力,却也明显渗透着诗人的宏大世界观。

通读朱涛的作品不难发现,他较少使用生僻的词汇,使读者在阅读中不会因为语词的难度而产生阅读障碍。但当这些平常的语词用朱涛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时,却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化学效应。这种词语的组合与搭配方式是朱涛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他总能发现一些日常词语中最细微、最隐秘的语素或者潜在含义,再用极强的联想能力加工,最后配合所要表达的情感,一气呵成全无滞涩。比如“美得像一枚指针/直刺云霄”。以一般的语言习惯来看,“指针”和“美”是不能形成直接语义关联的,一枚指针的美,恐怕需要更具体的描摹,是纤细的、粗壮的、挺拔的,或者简约的、复杂的等等。诗人用的关联方式不仅仅是说“指针是美的”,而是说“美得像一枚指针”,这短短7个字已经把指针的独特美感前置,重点又不是喻体指针,而是“美”的本体,随后诗人做出解释:“直刺云霄”。诗人用两行11字和一个巧妙而轻盈的词义关联结构,就表达出如此复杂的意蕴,可谓妙笔生花。

虽然做到了高度的陌生化,但朱涛的诗歌语言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自有一套独特的词汇系统,其中也不乏一些高频词汇。嘴、口、唇、舌是朱涛诗中最常见的人体器官,在他新近创作的200余首诗中出现超过百次,这个比例其实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而多数出现的嘴、口、唇、舌等器官词汇都有比较明显的共性,与其搭配的往往是沉默、哑哑、残破一类的形容词,此外,死亡是朱涛语言系统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表面上看,这是诗人经常思考生命彼端问题的必然结果,但朱涛对于生存与毁灭问题的理解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朱涛诗中出现的“死亡”往往不用来描述沉重的生命终结,而是一种与鲜活生命相对应的生命状态,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